

「高齡化社會研究」計畫書

一、研究主題名稱：台灣傳統文化價值觀下的高齡社會政策分析

二、研究人員：李佩芳、王正

三、研究之背景及目的：

本校自成立之後，即積極的發展高齡社會的學術研究，而且在師資上也相對的多元，因此可以從各層次、各種觀點加以詮釋高齡社會和老人福利政策的發展。我們知道，東亞國家在經歷 1997 年的金融危機，社會保障需求提高，迫使各國政府必須回應國內失業和貧窮等問題。2008 年底的全球金融海嘯，不但衝擊各國的經濟體系，同時也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不僅是失業和貧窮，在整個後工業社會下，人口老化、健康照顧、退休保障等新興的社會風險皆成爲重要的社會議題，各國政府皆採取各種措施以減輕人民所遭受到全球化衝擊。

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起，農業轉向工業的發展結果讓人們的生活形態產生劇烈的變化。透過各種政治、經濟行爲的方式，從西方傳遞到東方。而部分東方國家（如中國及日本）則從十八世紀的鎖國政策進行到如今將西方的經驗、價值觀及理論視爲普世的價值，用以直接對照在地現實。這樣的變化走過了過去整整兩個世紀，但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變革，及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及個人主義的極致擴張下，導致跨國企業的極度擴展及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爆發等，使得過去具有經濟強權的西方世界國家歷經空前的經濟低潮。也使得巴西、俄羅斯、印度及中國等四個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被視爲最有希望在幾十年內取代八大工業國組織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國家。而這樣的政治、經濟變革、轉換，也使得過去長期隨著經濟發展而傳播的政治、文化影響產生變化。尤其當前歐洲已開發國家大多面臨高齡化社會的問題，面對不可避免的高齡劃設會議題，歐洲各國也不停的尋找解套的方式。

當前，人口老化的議題已襲捲整個歐陸，因此歐盟議會亦於 2005 年針對老化的議題進行一項研究，試圖從東方國家因應老化議題的經驗，對歐盟國家的老化政策提出建議。因此，該研究挑選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南韓、香港及台灣等六個國家，對其因應老化議題所做的政策規劃進行個別分析，試圖提供歐洲於制定高齡政策時不同的思維。在研究中除了透過六個亞洲國家的現況進行瞭解與分析之外，同時在其研究中也認爲亞洲國家中家庭的角色與功能也是歐盟國家在推動高齡政策時，可以參採的策略。然而，任何一個政策在一個國家中可以被成功的執行，並不表示可以在另一個國家中得以運作。歐盟國家尚且不能回到過去同樣重視家系及家庭的傳統，而亞洲國家現今恐怕也無法輕易的拋棄長久以來的宗教或文化影響，建立一套獨立於社會文化價值觀之外的因應高齡政策。

東方國家雖目前大多沒有如歐洲國家立即面臨嚴重的人口老化、代間連結趨弱的問題，亦無因長久的福利國家發展歷史而衍生有關國家與家庭、個人間責任的種種辯駁。卻在千年來發展深遠的孔儒孝道文化影響下，在現代與傳統文化的拉鋸戰中產生許多的斷裂與爭議。某些學者即指出由於日本也受到儒家文化洗禮，同樣提倡敬老思想並對家庭功能寄予厚望。但在各種社會變遷的影響

下，日本社會對於老人的扶養也逐漸走向「社會性扶養」，即將老人的扶養責任由家庭責任轉向國家社會的責任。然而扶養觀念雖然低落，但根據日本國內的調查，仍有半數的中生代家庭保有親自照顧老人的意願。因此在社會性照顧概念在日本已經勢不可擋的狀況下，日本朝野體認到與其發展機構式照顧，不如推動「居家照護社會化」，讓老人回歸家庭且生活在習慣自由的社區中也更能滿足人性需求。

那究竟如何在新、舊不同的文化價值觀的拉扯下找到平衡點？某些韓國學者認為未來勢必由國家、社區及家庭共同分攤整體的責任，並且勢必要為整體的社會成員發展一新的、現代化的集合式孝道觀；而香港學者則實際的認為社區不可能長期的代替政府實行照顧的角色，不僅僅是因為逐漸式微的家庭關係，而是因為越來越長的生命餘命衍生越來越多的需求，且這些需求並不是非正式的照顧所可以承擔。德國學者指出「老年人」或「退休」的概念是一種資本主義對於人力資源經濟性利用的社會建構概念，因此老人及退休就成為社會與經濟上的負擔，而不再是一種人力資源。但隨著高齡人口越來越多以及人類生命餘命可以預期的不停延長，因此國家、媒體及個人都必須要重新省視「老年」的意義，而非受制於資本主義下的思考，將老人視為依賴者、職場的被淘汰者，甚至一昧的宣揚「年輕的意識型態」。無論東方、西方無不在尋求最佳的平衡點。

亞洲文化特色中另一個最重要的文化特質即儒家及孝道文化，其中強調親屬間的責任以及對於父母的孝行。這個倫理的文化價值觀，也並非僅實現在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等華人國家中，同樣也存在韓國、日本、泰國、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其他亞洲國家，使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呈現相當不同的樣貌。而這樣的文化也會深深的影響社會對於高齡者的定位，以及國家對於高齡者的各項責任的定位及歸屬、安排。在亞洲國家中，雖然許多國家同樣接受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但結合了宗教及文化等因素影響，仍不可能單純的以資本主義及個人主義的思考方式建構整體的高齡者福利體制。

國際上對於人口老化的關注，不僅僅在於各國內部的商議，不同的跨國組織也提出各種因應老化社會的倡議，如聯合國大會 1991 年通過「聯合國老人綱領」中，提出五項要點，包括：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實現與尊嚴。而後，WHO 亦提出活力老化 (Active Aging) 概念，定義活力老化(active ageing)乃是為了使老化成為正面的經驗，因此活力老化即為具備健康、參與、和安全最佳化機會的過程，以促進個人老年時的生活品質(active ageing is the process of optimizing opportunities for health, participation and security in order to enhance quality of life as people age)。在不同文化價值觀的條件下，如何達成上如同述的兩項跨國組織對於因應高齡社會的倡議，以足以呈現相當不同的面貌，而面對各種社會變遷的發生，家庭結構的變化、女權的發展、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等，基本價值觀也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面對這樣的挑戰及變遷，究竟應該如何發展顧及孝道文化的高齡政策？是否在女權發展與孝道文化是一場零和的遊戲？究竟個人主義是否是帶領個人邁向富足美滿人生的最佳道路？是否在歐美工業國家強調資本主義及個人主義發展的經驗中，可以讓我們重新思索國家、家庭及個人的定位？本研究乃欲針對上述的提問進行探究，並企圖尋求在孝道文化的背景因素下，如何發展亞洲國家最適高齡社會政策的影響因素。